



跳出社会时钟的人

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裴思童

社会是有时钟的。一些是显性的，写在条例里。比如6岁被允许进入小学，最低12岁应开始承担刑事责任，18岁无论你是否准备好，你都将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名成年人。

一些是隐性的，写在人们心里。比如28岁，是一名女性在婚恋及职场上所谓最后的黄金期；35岁，是职场里一条隐秘的分界线；40岁，一个人该有稳定的事业以及婚姻；50岁，就应该退休照顾孙辈。

社会时钟是一个尺度，它用一种统一的规范丈量着每个人的生活节奏，锚定人们在不同阶段应有的权利与义务。

但是作为具体的个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脚本。社会的时钟无法框定个体的意志，在同一张表盘上，总有想要跳出刻度之外的人。

逆行者

24岁的罗子璇决定重启高考艺考，就像分手已久的冷心恋人突然回头。

那时她工作稳定，收入良好，上一次学习跳舞是两年前的事情，同期考生都比她小5岁以上，而毕业后她将近30岁，很可能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，但她还是决定任性一次。

62岁的李真在经历一场疾病后，开始健身，并在社交平台上记录62岁健身日记；27岁的李雷从疲惫不堪的研究生学习中逃离出来，休学来到新西兰旅行打工；42岁的李娟辞去某房地产集团策划部总经理的职位，成为一名独立摄影师。

他们自称逆社会时钟者，反对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情，主张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，一切都准时。

王珂也是其中的一员。从表面来看，王珂名校毕业、工作体面、薪水不错，有一份漂亮的履历，但职业其实都是两面的，一面是拼命留在纸面上的给别人的印象，另外一面就是你自己的感受，而我的自我感受非常糟糕。

大学毕业后，王珂进入咨询行业，这是一份在很多人看来非常体面的工作，但她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落差。看似光鲜亮丽的企业之下，具体到个人却可能在做一些无意义的鸡零狗碎的工作，比如反复调整PPT的字体颜色。

29岁那年，王珂与即将结婚的男友分手，准备很久的专业考试没有通过，母亲遭遇车祸自己却因工作太忙而无法照顾，事业依旧毫无起色。在巨大的幻灭和无意义感下，王珂大病一场。

病愈后，她决心摆脱这一切。2019年年底，王珂开始留学申请。2020年2月，她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如今，她与在哈佛大学认识的同学一同创业。

这是一些会被精选置顶、广泛转载，在各类社交平台获得高赞的“逆时钟”故事。读者们通常会在阅读他们的故事时被鼓舞，甚至在脑海中幻想属于自己人生的另一种可能。

故事的B面

但故事的B面通常是这样的。你家闺女现在在干吗？电梯里，有人问道。

准备考研呢。母亲的语气有些不自然。张洋戴着口罩和鸭舌帽，垂头站在角落一言不发。

考研只是她搪塞父母的说辞，实际上，她现在什么都没在干，字面意义上的无所事事。

大学毕业后，同学们或找到工作或继续升学，最不济也在积极备考或者考研二战，只有张洋一个人回到家里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着窗外的两颗柳树发呆。

如果我说我就是想休息一下，你会信吗？

从大三开始，张洋逐渐发现自己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。朋友们的讨论突然之



罗子璇在舞蹈室练舞。



李真在健身房。



2022年年初大雪后，王珂在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门前拍摄。

间就从吃喝玩乐，转变成了准备去哪所学校读研，或者打算找什么样的工作，张洋在这样的讨论中总是沉默。

张洋洋觉得自己在跑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。曾经，她以为，高考是这场比赛的终点，但现在，目的地变成了一份好工作，而未来，或许还有美丽的婚姻、优秀的孩子等各种标杆，这场比赛无法喘息，难以停下，稍不留神就会被后来者踢下跑道。

但如果我主动退出跑道呢？毕业后，张洋打着为梦想再拼一次的旗号回到家里，堂而皇之地开启了她的休息计划。她装模作样地买了几本考研书籍，实际上每天关着门在房间里发呆、读书、看电影或者打电子游戏。

刚开始的确是快乐的。张洋把此前在大学期间积攒下来的想读书目挨个儿读完，买了一个新的游戏机，偶尔需要在父母查岗时假装学习。

但很快，快乐消失了。9月，开学季到来。朋友圈里突然被各种录取通知书刷屏，原本的老同学们来到新学校读研，晒着新朋友和新生活，而张洋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出门，床头堆满了零食袋和游戏卡。

张洋突然感觉自己被落下了。她觉得自己像是停在了一个真空的时间泡里，只能呆呆地看着其他人从自己身边呼啸而过。

朋友和亲戚们询问起她的近况，张洋无法说实话，她发现自己既不属于某个学校，也不属于某个公司，成为了一个失去社会身份的边缘人。

张洋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，觉得自己像一个失败者，但其实，我不过就是想休息一下，为什么我一定要马不停蹄地找工作或者继续读书呢？为什么不能允许我作出第三种选择？

陈深与张洋有相似的困惑。研二那年，陈深自作主张选择了休学，原因是严重的抑郁症和身体问题。

办完休学手续的那天晚上，父亲的情绪状态异常差，他反问陈深：为什么是你不要休息，有的人生了重病也没有休息，有的人天资很差也没有休息，但是你为什么要去走这条路？我周围从来没有同事朋友的孩子休学，为什么只有你坚持不下来？

陈深被父亲的话刺痛，觉得自己成了家族耻辱。

她从小便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听

话、懂事、成绩优异。高考完，陈深在父亲的安排下选择了电子信息专业，未来的规划是一路升学到博士最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，陈深接受了这样的安排。

但大一下学期，问题出现了，陈深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也不喜欢这个专业，但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期待，陈深还是选择坚持。大学四年，陈深几乎放弃了社交，整天泡在图书馆里，才能勉力维持成绩。

但到了研究生阶段，原本靠努力换成成绩的路数走不通了。每周组会上，面对同门滔滔不绝的分享，陈深说不出一个字，时常被老师点名批评。同组的4个同学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，陈深听不懂也插不上话，逐渐被同门疏远。

在巨大的落差感下，原本在大学期间便长久积压的抑郁情绪终于爆发。研一上半学期的期末考试周，陈深提不起力气做任何事，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周，后来陈深被诊断出了抑郁症。

休学的念头就在这时产生。当陈深向父母谈起休学意愿后，他们回应的却是你休学可能会让亲戚朋友议论，你要再忍忍。而且你是我的女儿，你天资肯定很好，你可以做这种事。

经过一年的挣扎以及与父母反复的争执，陈深自作主张向学校提出了休学申请。但她觉得自己的逆行之路，也就到此而止了，一年后她仍然会选择重归正轨，继续完成学业，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休学使得父母感到丢脸，这也是一种不孝。

陈深喜欢电影，高三，她还坚持在下晚自习后看两小时的电影，但她从未想过从事相关工作，理由是父母不会同意的，她喜欢心理学，甚至想放弃自己的专业重新学习心理学，但前提是，没有来自父母及外界的压力。

在采访结束后，陈深语气哽咽地补充了一段话：我对父母的愧疚是社会强加给我的枷锁，同时也是强加给父母的枷锁。我希望这个社会不要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这群人。我们为什么要背负丢人的枷锁？仅仅是因为我们想换一条道路，或者想停下来歇一歇吗？为什么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耻辱？

代价与现实

比起观念的束缚，现实的压力要来得更为残酷一些。

休息9个月后，张洋开始感受到自己

的越轨带来的代价。

理所应当的，考研失败后，张洋开始寻找工作。理论上，张洋出身名校，在校期间成绩不错，也有过几段大企业的实习经历，但她发现简历上近一年的空窗期，抵消了她所有的优势。

现在的企业宛如有处女座情结的直男。张洋说，错过应届生校招的她，只能和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应聘者一同参与社招，而她显然没有任何优势。

愿意给她机会的小公司，却在面试时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：简历上为什么有这么长一段空窗期？刚开始，张洋会努力为自己编几个看起来好听一些的理由，比如专注考研，学习专业知识，或者投身公益，积极参与社会实践，但对方大多撇撇嘴，不置可否。

后来，张洋被反复的质疑烦闷了，直接暴躁自弃说：我就是不想一直这么卷，我想给自己放个假。面试官沉默半晌，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：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态度。接着便再无下文。

王珂也有相似的经历。

在决定去哈佛大学之前，王珂曾用两年的时间为自己谋求新的职业道路，她投出了将近250封简历，面试过各种千奇百怪的公司，但最终的收获寥寥无几。这个社会默认你看直线，人没有办法走错一步路，一旦人被某种力量推向一条错的路，全世界的大门都可能闭上，因为你的下一步，永远取决于上一步，一旦走差了，很难有人再给你机会。

还有职场对女性的年龄歧视。王珂曾亲耳听到公司里的招聘者评价某位候选人：这个人刚结婚，肯定是要过来生小孩的，不要。这位招聘者也是女性。

那些跳出束缚的人，背后通常有充足的资金支持，没有养家重担却有一群支持他们选择的亲友。他们有勇敢的资金。但更多人可能像王磊一样，王磊40岁，他也想辞职读研，但他觉得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

首先，最为现实的，经济问题如何解决？作为一名背着房贷、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性，王磊没办法卸下赡养家庭的责任，只为追求自己的梦想，这太自私了。

其次，读完硕士之后呢？在短暂的逃避之后，现实的压力还是会回归。那时候，作为一名没有什么资源的中年人，他又该如何回归社会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？

在王磊看来，这个社会对于年龄很苛

刻，社会主流的审美观，欣赏年轻美好，厌恶丑陋衰老。王磊曾尝试性地在各大招聘平台投递简历，但最终结果是，现阶段的他只能拥有三类工作，需要远离家庭的驻外工作、保险销售以及催债人员，而这并不符合王磊对自己的期待。

40岁的悲哀就是丧失了可能性。丧失了工作的可能性，丧失了生活的可能性。除了中彩票、撞大运之外，剩下的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。是的，那个黑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死亡。王磊在个人主页里在写道。

理想世界

为什么逆社会时钟会如此困难？社会时钟又为什么会存在于我们的社会？我们应该选择打破它吗？又是否存在一个更为理想的社会模式？

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作或研究时间社会学，在他看来，社会时钟的存在主要源于两个核心的原因。一是现代国家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目标导向下，人类生命变成了一种资源，而生命本质上就是一种时间过程，因而对每个人的生命时间进行统一管理，便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。

其二，如何对有限物质资源进行适当分配是很重要的国家管理要素，而时间就成为了一个有效的筛选标准。比如教育时间，就是一种典型的机制，它规定每个人在固定的时间完成相应的内容，然后在每个时间点用考试做分割，以此来对人力质量进行排序，教育的理念本应让学生能学会事情，但今天的教育进度不是按照学习效果，而是按照时间来推进的，然后再用时间当门槛，把有限时间内学不会的人给淘汰掉。这其实和教育理念相互矛盾。

郑作或曾在德国读书，在德国，大学之后便不再设有学习的时间限制，毕业的时间取决于你什么时候修够相应的学分，学会所有的专业技能。他指出，这或许为消解社会时钟，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。

但中国的情况显然更为复杂。郑作或认为，中国在短短40年间完成了欧美200多年的发展任务，这同时也导致不同世代的问题与观念叠加在一起。比如在上一辈眼里，25岁是一个适婚年龄。但在现今的教育制度下，很多人走出校门时可能已超过25岁。但中国又是一个国家本位的国家，父母对于孩子的人生有极大的话语权与决策权，这就导致年轻人既要面对他们自己的时代问题，又要面对上一辈强加给自己的任务，冲突与束缚便如此诞生。

而职场对于员工的年龄限制则是一种发展陷阱。郑作或指出，在改革开放初期，许多领域尚是空白的时候，很少有人会考虑年龄问题。但当一个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，此时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的利益，就需要更为标准化的人力，更愿意顺应社会时钟的人，则相对而言会成为标准化。因此，当一个领域开始使用年龄做门槛时，也就意味着该领域会越来越被既得利益者所霸占，而这恰恰是它陷入发展陷阱的开始。

那么究竟该如何打破这一切呢？真正的答案或许有些悲观。郑作或曾提出过一个观点：没有人可以拥有绝对自由。没有一个人的时间是自己的功劳，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，必然是因为他背后有直接或间接的资源去支持他。而一名逆社会时钟者，通常需要对来自观念与现实的 multidimensional 压力，这远远不是空喊几个勇敢做自己的口号便能改变的现实。

但从长远来看，答案又或许是乐观的。郑作或很喜欢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一句话：唯有绝望才能拯救我们。他指出，当我们这一代的多数人都觉得很难做自己时，我们会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更多的自主空间。而国家发展的平稳化，也使得世代与世代之间的距离拉宽，我们不再需要像从前一样在浓缩的时间里同时解决几代人的问题。因而当时间的轮转把我们这一辈变成上一辈时，我们或许可以创造出下一个不一样的社会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王珂、张洋、陈深、李雷为化名）

三卫生间，无疑向前迈了一步。它取消了照顾婴幼儿、老人职责的性别属性，从观念到方便，都考虑到人本身。低生育时代遇上老龄化社会，有人生活的地方，就得同时追求儿童友好、青年友好、老年友好。

遗憾的是，母婴室也尚未普及。不久前，几位女士在火车站出发行李箱为一位母亲搭建临时母婴室，让这位母亲给哭泣的小婴儿喂奶，画面温馨，但原因尴尬，找不到私密空间。也有灯和地板一样锃亮、大牌林立的购物中心，母婴室却塞满杂物，或永远推不开门，甚至还有被喝多的大爷爷们儿独占的情况。

当然也有好消息，上海市卫健委前几天发布《上海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》，明确经常有母婴逗留的公共场所应当建设母婴室，这一范围包括大型商业网点；机场、车站、高速公路服务区，以及医疗、文化、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。

现在，职场年轻人还希望在工作单位、楼宇设立母婴室，一方面是便于哺乳，另一方面是给还在哺乳期就回归工作的“背奶”宝妈们提供及时存储乳汁空间。

与其催婚催育，不如创造便利，让年轻女性摆脱对生育的恐惧，快乐、从容、有尊严地当妈妈、做女人。

第16个国际罕见病日：

一位医生的告白

□ 于仲勋

于大夫，这孩子你快看一眼！摺下电话，赶至床旁，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“松软儿”，呼吸也不顺畅。

我脑中瞬间浮现一连串可能的病因，外伤？先天性心脏病？莫不是某种罕见病吧！

我正苦思冥想，第16个国际罕见病日（每年2月的最后一天）如期而至。打开手机，朋友圈是中国罕见病联盟各项学术活动、各大医院的义诊消息。

何为罕见病？新生儿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、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、患病人数小于14万的疾病，符合其中一项即为罕见病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罕见病并非罕见，其病种数量超过7000种，在我国有超过2000万患者，每年新增超过20万。人们略有耳闻的白化病、苯丙酮尿症、渐冻症（肌萎缩侧索硬化）都是罕见病。可罕见病又的确罕见，在罕见病协作网建立之前的2019年，约有66%的医务人员不了解罕见病；国家公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仅纳入121种疾病。还有些疾病，发病率极低、病因复杂、诊治数年都无法明确诊断，虽然无法确定疾病的名称，但按照定义，也属于罕见病了。

无论是哪个专科的医生，从医学院开始，或多或少都会与罕见病打交道。作为医生，我十分感谢每一个罕见病患者。当他们千里迢迢带着化验单、片子、病历，把小山一样的资料摆在门诊办公桌上时，我会同时感受到信任、压力和责任。病情稳定时，一步步抽丝剥茧；病情加重时，一招招化险为夷。年轻的医生、年长的教授，经过查房、会诊、MDT（多学科诊疗）讨论、随访、文献学习、实验室研究等，与罕见病患者共同成长。

对罕见病的持续深入的研究，也推动了相关医学科学的发展。比如，为了更精准、更高效地找到罕见遗传病的致病基因，基因测序技术早已从最原始的一代测序（Sanger测序）发展到全基因组测序。为了让携带家族遗传变异位点的父母孕育出健康的宝宝，生殖医学也在持续探索，尝试改变那些家庭的命运轨迹。因此，关注罕见病、重视罕见病、研究罕见病，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工作只做到上述层面，还远远不够。作为医生，我们总希望患者有药可用，有药用得起。2020年，一个庞贝病男孩以662分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，除了他个人的努力，还有一个因素——天津是首个将庞贝病特效药美而赞（注射用阿糖苷酶α）纳入医保的城市之一。现如今，脊髓性肌萎缩症（SMA）的特效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从70万元一针降至3.3万元，口服药司扑兰由每瓶6.38万元下降至每瓶3780元。

当然，还有很多疾病无药可用，很多家庭用不起药，不得不选择放弃治疗。曾经有一位家长，拿着印度产的仿制药问我：于医生，我孩子吃这个药行吗？我不敢说行，毕竟是非境内批准上市的药物，我也说不准。因为他的孩子患有罕见的自身炎症性疾病，原研药太贵，家里已经卖掉了一套房子。

新药研发从分子立项，到临床前、I期、II期、III期开发，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，投入难以估计的人力、财力，还经常折戟沉沙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（NMPA）及药品审评中心（CDE）鼓励罕见病的药物研发，且制定了诸如罕见病新药拥有7年市场独占权等政策。众多本土药企在罕见病的药物研发上跃跃欲试，却又裹足不前。两会召开在即，我真诚希望罕见病能继续得到代表委员的关注，推动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药研发政策，进一步提高本土药企罕见病药物研发的待遇和热情，建立高校、医院、企业之间快速高效转化研究成果的机制，进而打破跨国药企对罕见病药物的垄断，让中国罕见病患者有药可用、有药得起。

诊断和治疗，不该是罕见病患者的全部日常，作为医生，我希望他们可以求学、恋爱、奋斗、生活——而这些，仅靠医学远远不够。我不止一次地被家长请求，给患儿开“免体复学”等各种各样的证明，而我也知道，在很多地方，仅仅因为缺少一张转诊单，患者就无法进行医保报销或报销的比例很低。一张又一张证明，会给本就艰难的罕见病家庭带来更多困难。

诸位，如果你的班级中有同学患有罕见病，如果你的单位里有同事患有罕见病，希望你对他们多加关爱，增强他们生活的信念，也让他们为自己的梦想和这个时代发光发热。请不要轻易作出无法胜任的判断。当下无数场景，远程办公模式成熟，让他们工作更灵活些，办公更方便些。请相信，他们也会让团队更有活力！

刚要停笔，前述那个孩子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又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会诊的罕见病例。

这一天，为他们呼唤不平凡的爱！（作者系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医生）

用几平方米摆脱社会性尴尬

□ 李新玲

今年春节期间，哈尔滨一女子因质疑6岁男童上女厕，被男童家长持续辱骂近30分钟。这一事件一度冲上热搜，引发热议。网友态度不一，其中更多人质疑男童家长，孩子6岁，不应再到女卫生间了。

类似冲突不是个案。去年底，福建泉州张女士独自带两岁儿子逛商场，因身体不适，怕孩子独自在外不安全，就带进了女厕，被一群女生骂“没素质”。

相信这些事件中的妈妈都别有滋味在心头，或是爱子心切，或是情况特殊。不光是母亲带男童，父亲带女童或子女陪伴高龄父母外出、就医，都可能有一种无奈。不过，这种社会性尴尬不应由当事人承担，这是社会的尴尬。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只分男女两种，无法为特殊群体或者特殊情况下公众提供服务。

在我国，香港《公厕（行为及举止）规例》就明确规定：在公厕内，任何人不得进入异性使用的部分，但年龄在5岁以

下并由一名女性（男童）亲属或护士（男护士）陪同的男童（女童），则不在此限。据报道，国外一些地方的公共场所，也有禁止超过6岁的儿童进入异性更衣室、洗手间等公共区域的规定。

社会问题还要靠人的智慧解决，文明的进步体现在一个个细节上。第三卫生间，或称家庭卫生间，为解决上述问题而诞生。

第三卫生间，指用于协助老、幼等行动不便或行为障碍者使用的厕所间，主要是指儿女协助老父母、父母协助小孩等。

2016年年底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的《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》就要求城市中的一类固定式公共厕所，二级及以上医院的公共厕所，商业区、重要公共设施及重要交通客运设施区域的开放式公共厕所，均应设置第三卫生间。2016年，原国家旅游局办公室也曾发布过《关于加快推进第三卫生间（家庭卫生间）建设的通知》，要求所有5A级旅游景区必须具备第

三卫生间。通知中，明确了面积、设施，以及标识等。

眼下，第三卫生间的普及速度还不够。在大城市中，一些景区、博物馆、规模较大的购物场所可以见到，除此之外，还是少见。另外，即使见到，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如何使用，很多人误以为是给残疾人使用的。

2022年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冯远征提出，虽然城市内的第三卫生间数量在增加，但其实际的应用还存在问题。据她观察，现存第三卫生间有的标志不清，有的堆满了杂物，有的为了简便管理，而直接一关了事。

她建议，要把第三卫生间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建好、建到位。第三卫生间要真正发挥作用，还需要从转变观念、完善细节和普及使用知识3个方面进行改进。

相比硬件，观念和认识更难突破和提升。很多事情不感同身受，很难有所触动。

近年来，为特殊人群提供服务的设施在不断增加，盲道、坡道、扶手等无障碍

设施在增加。硬件多起来的同时，观念也在发展。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就是母婴室到第三卫生间的变化。虽然他们功能不完全相同，却能体现一种进步。

公共场所的母婴室是为照顾婴幼儿设立，但是母婴二字，还是默认承担育儿主责的是母亲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男性社会的惯性。

当下社会，特别是技术进步主导下的21世纪，女性依旧在默默付出。有一项数据显示，全世界75%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，家里的各种家务、从孕育哺乳到教育孩子的漫长周期、对老人的长期照料等，都是没有报酬的工作。

此外，因为生理构造不同，女性如厕时间是男性的2.3倍，但目前大多数公共卫生间，男女面积相同，因此女卫生间门口经常排大队；夏天写字楼冷气开足，女性办公时感觉到寒意，不是因为体质差，而是因为女性身体代谢率低于男性35%；超市里，货架高高耸立，因为设计者参照的是男性身高。

参考上述事例来看，公共场所的第